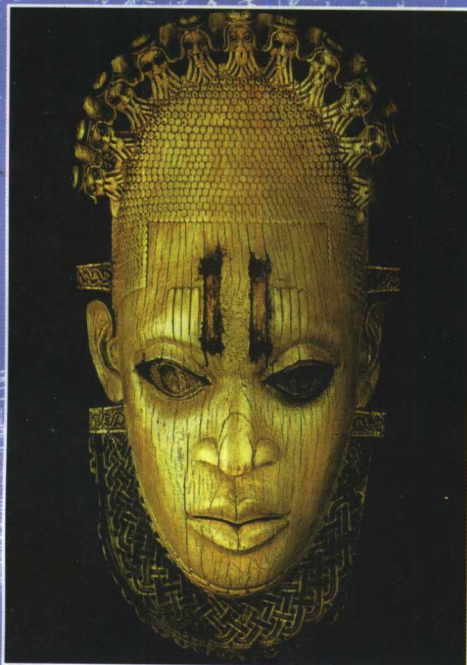


当代学术：川籍学者文丛

日見一
堂孫敦和
史亦共
絕無僅有
盛會也何幸
隆溪

張隆溪



四川人民出版社

THE TAO AND THE LOGOS

道与逻各斯

會

上海女學堂之設
倡議莊
修澤珊
羽觀察
施子英
助之既大會賓客至相
討論要

軍閥坤
之皆不

座張氏
設延陽

而滬上
西國各

人并技
不覺張

別者一
店其大

堂孫敦和

BOOKS OF SCHOLARS

张隆溪

道与逻各斯



THE TAG AND THE LOGOS

藏书

冯川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温 洁

封面设计:钟 鸣 唐璟萍

技术设计:王 力 古 蓉

责任校对:伍登富

·当代学术:川籍学者文丛·

道与逻各斯

张隆溪 著 冯 川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冶金部西南勘察局测绘印制厂

开本 850×1168mm1/32 印张 9.75 插页 3 字数 227 千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3979-4/I·601 印数:1-6100

定价:18.00 元

前 言

本丛书为四川籍中青年知名学者的学术论著选集。

巴山蜀水，钟灵毓秀，自古孕育了众多的风神俊逸之才。但由于“贵远贱近”之风使然，今人易首肯古代诗人哲人，而对现代学者则多持一种更审慎的态度。近代以来，西风东渐。文化上的中西之争、古今之争，使现代学者相对于古代学者而言，似乎有了更大的承负。这砥砺了当代学者的学术品格。自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在思想和学术的广度上有新的开拓，为本世纪中叶一度中断的学术研究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当代学术中的“川籍学者”的提法，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一种文化概念。事实上，在这个多元的世界，一切界限的绝对划分都有其局限性。如果从地缘文化的角度去看当代学者的思想形成、文化素养和言述方式，或许会生发出一种新的意味和新的结论。近些年来，学术界对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视，其意义当亦在此。

我们欣然推出这些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并在全中国引起反响的川籍学者的著作，并有意识地从出版者的角度、以地域文化的眼光展现当代学术，以期为研究当代中国学术提供一个文化地

缘学的背景框架。

这套学术文丛具有开放结构。首批推出的是学术界近些年读者较为熟悉的学者的论著。今后将进一步扩大，使出版学者“有分量著作”真正成为连接作者与读者的桥梁。

我们真诚地希望读者朋友对丛书提出批评建议。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2



张隆溪，四川成都人。一九四七年六月生，一九六六年为成都九中高中三年级学生。文革后于一九七八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一九八一年获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并留北大任教。一九八三年赴美留学，一九八九年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受聘于加州大学河滨校区，现任该校比较文学教授。自一九九八年起，又担任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讲座教授。主要著作有《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比较的文学阐释学》（英文）、《文化对立批判：中国与跨文化理解问题》（英文）等。研究范围在中国古典文学、英国文学、中西比较文学、文学理论以及现代与后现代问题。

87.11.72/18
14

目 录

1 中译本序

18 序

第一章 对书写文字的非难

35 天才的非自觉创作

45 阐释学的任务

52 注释的必要

58 对话与摹写

66 道与逻各斯

第二章 哲学家、神秘主义者、诗人

85 反讽模式

95 从语言批判到神秘主义

107 拴住了舌头的缪斯

123 对失语的袭击

第三章 无言之用

137 里尔克：与天使的疏离

152 诗作为赞颂

168 声音与意义

176 马拉美：空白的意义

193 陶潜：淳朴的挑战

206 无言诗学

第四章 作者、文本、读者

- 221 同一性幻觉
238 实际的证据
253 文本框架与未决定性
273 读者的作用

结束语

- 290 走向诠释的多元化

附 录

- 300 跋
302 学术著作简表

中译本序

这 本讨论文学阐释的书最初是用英文写成的，1992年由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曾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书奖的荣誉奖。此书出版以来，有不少朋友曾敦促我译为中文，但我却一直没有动笔逐译。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忙于教学、研究和其他冗务，实在无暇顾及译事，但另一方面则更因为用中文和用英文写作，在运思行文上有很大区别，读者对象也很不一样，直接翻译不如改弦更张，用中文来重新写一遍。可是重写固然理想，却又谈何容易，于是此书的中文版就这样一直拖延下来。近来四川人民出版社策划“川籍学者文丛”，丛书编辑温涪女士不仅与我联系，希望把我这本《道与逻各斯》收在这套文丛里，而且邀约了在四川大学任教的冯川先生将拙著译成中文，使这本书能与国内读者见面。我离开四川成都的老家已经十多年了，但无论走到哪里，身在何处，对养育过我的故乡，总是有许多缅怀眷恋之情。所以这本《道与逻各斯》尽管不是我意愿

中改写的样子，但能将这个中译本作为文丛之一种，呈现于国内读者之前，也使我十分欣喜。我应当感谢温洁女士和此书译者冯川先生，是他们使拙著中有关语言和文学阐释的一些基本思想，能够以中文的形式呈献给广大的读者。我和冯川先生以前并不认识，但我知道他有自己的教学工作，有自己的研究和写作计划，而且也是“川籍学者文丛”中一位同列的作者。冯先生愿意放下自己手头的其他工作，花费不少宝贵的时间精力来翻译我这本书，这是我特别感激的。无论从阐释学或是比较文学的角度看，翻译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翻译不仅是对原文的理解和解释，而且也是一种创造。把一本书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原作者只是通过译者才可以说话。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在译本里其实是译者在说话，因此就译本的语言而论，译者才是译本真正的作者。我希望《道与逻各斯》的中译能够不负译本作者的一番苦心，在国内引起对阐释学问题的兴趣，并有助于批评理论和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这个中译本离英文版原书的出版已经有五年多时间，对于书中个别地方的论述，我现在或多或少有些不同的看法，但在基本观念上，此书仍然能大致代表我对东西方比较的文学阐释学的见解。这也许说明我自己在学问上没有什么长进，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因为在各类文学批评理论中，我仍然对阐释学最有兴趣，觉得它最能为中西文学和文化的比较研究提供一个学理基础；而在有关文学阐释学的许多问题上，我的看法和此书最初写作时并没有太多变化。此外，用中文来深入探讨阐释学的专著，迄今仍然不多，本书虽然不敢说如何深入，但我相信它仍然有助于读者了解阐释学，尤其是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了解文学阐释学的梗概。因此我希望对于文学阐释学的研究，拙著的这部中译仍然能作出些许的贡献。由于这本书是在美国写的，在讨论中国古典文学时，我与之对话的往往是一些西方汉学家的著作，至于当代用中文写

成的学术著作，除钱钟书先生的大著往往是我立论的重要依据之外，相对说来其他著述则征引较少。为保持此书原貌，这种情形在这个中译本里一仍其旧，未做任何改变。我希望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把国外一些汉学家的论述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本书的有关讨论，既了解国外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所做的贡献，同时也看出其中的一些问题。我希望达到的目的之一，正是能沟通中外不同的语言和学术传统，对文学和文化问题的理解与研究作出贡献。

阐释学一词乃西文译名，德文称 Hermeneutik，英文称 hermeneutics，中文译名有解释学、诠释学、解经学等等，不一而足。在这些不同的译名当中，我认为解释学虽然意义颇为明确，却嫌太过寻常，不似专名，而西文原词与寻常的解释一词有很明确的区别，译名也应该有所区分才是。诠释学则似乎太过强调文字训诂的意义，不能完全传达西文原词较广泛的含义。解经学意义最狭，因为阐释学虽然滥觞于基督教圣经和古典作品的解释，但其含义并不局限于经典的解读。由此可见，阐释学一词既可以包含其他数词之意，又有别于较寻常的解释、诠释等词，作为专名似乎最妥。此外，钱钟书先生《管锥编》第一册论及乾嘉朴学训诂考据的方法，采用了“阐释循环”这一术语。钱先生说：

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虽然，是特一边耳，亦只初枕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文”）；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

环”(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者是矣。^①

在中文著作里提到阐释循环的概念，这大概是最早的例子，这也是我采用阐释学这一译名的另一个原因。

阐释学作为一种专门学科或作为理解的艺术，固然来源于德国哲学的传统，但其研究的问题和其精辟见解的应用却绝不限于某一语言和某一文化传统的范围。不过阐释学在西方还主要是在哲学的层次上讨论得比较多，在文学的层次上讨论得比较少，而且无论是哲学或文学的阐释学，都很少甚至根本没有涉及非西方的文学和文化。本书的讨论则一方面着重在文学的阐释学，另一方面更超出西方批评传统的局限，从东西方比较的视角上来探讨理解和阐释的种种问题。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谈谈我所理解的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含义。在目前以东西方比较文学为题目的论著已经不少，但如果我们只是把东方和西方的作品并列排比，下面没有更深一层学理上的依据，这样的“东西方比较文学”就往往给人造成误解，使人觉得比较文学大多不过是一些肤浅牵强的比附，既不能加深我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也无助于我们对文学的鉴赏。此外还有一些以东西方比较为名的研究，只是机械搬用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的方法、概念和术语，拿来硬套在东方文化或东方文学上，其结果是产生一些看来时髦的理论研究，但与中国文化、历史和文学的实际却始终隔了一层。其实理论研究本身对于东西方比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西方，不同文学传统之间毕竟有许多共同的文化背景，所以比较研究曾特别注重各个文化和文学传统之间实际的接触和影响。但由于东西方文学和文化相互间的实际接触只是在近代才较多，如果比较研究局限于疏理这种实际的接触和影响，那么大部分丰富的古典文学和文化就都排

^① 钱钟书，《管锥编》第2版（北京：中华书局，1986），171页。

除在比较的范围之外了。中西文学的实际接触和相互影响当然值得研究，但超出影响研究之外，以理论问题作为比较的基础，则可能天地更为广阔，意义更为深远。一些过分强调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学者，对这种以理论问题为基础的东西方比较往往抱有很深的怀疑和偏见，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不少有眼光的学者已经认识到这种比较研究的重要性。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克劳多·纪廉（Claudio Guillén）就在其所著《比较文学的挑战》一书中提出，以理论问题作为基础的比较将会成为比较文学未来发展也许是最重要的方面，而对这种理论的比较或者说比较诗学，纪廉认为“今日的东西方研究可以提供特别有价值 and 希望的机会。”^②比较诗学超越东西方文化的界限，研究东方和西方共同或类似的批评概念和理论问题，这样的研究如果能避免过度狭隘和抽象，同时注意同中之异，异中求同，就可能比传统的影响研究取得更有价值的成果。

任何理论按其本身的定义就须超越民族和语言的界限，因为理论起码应当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不能只适用于一时一地或一事一物。文学理论可以提供一个学理的基础，使我们可以研读在历史上没有关联、在文化上互不相同的各类作品，并由此取得关于文学本身性质的一些洞见。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任何理论总是从具体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生活环境里产生出来的，在理论的普遍性及其具体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之间，总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和紧张关系，理论探讨也就应当处理这种紧张关系，考虑理论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适用性。因此，理论固然可以为比较研究开辟新的天地，但是真正具有理论性的研究，就必须把不同的文化传统放在平等的地位上，而不能只是把西方理论的

^② Claudio Guillén, *The Challen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rans. Cola Franze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93), p. 70.

概念、方法和术语机械应用到非西方作品的阅读中去。如果说文学理论是对文学作批判性的思考，那么理论研究首先就须对理论本身也作批判性的思考。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因为无庸讳言，近代以来我们讨论文学和文化所采用的理论，大部分都来源于西方。如何在采用西方理论的同时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使理论探讨符合我们所处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实际，的确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一方面，种族自我中心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或文化沙文主义的态度，即那种把东方文化优越论作为比较研究预先设定的目的，我以为是毫不可取的。但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也不能拾人牙慧，把西方各种最新的时髦理论作为依据和标准，而完全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形。如何达到合理的平衡，这需要在每一个研究课题中视具体的情形而定，但就中国的情形而言，重要的恐怕是要强调认真研究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的这个看法无疑和我最近 15 年来在美国生活的经历有关，尤其和在美国大学里学习和教学的经历有关。在英文本的序言里，我已经对有关阐释学的一些问题作了说明，在这里我想就中西比较文学的一些问题，尤其是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之关系，再简略地谈谈我的看法。既然这些看法是与我自己的生活和学术环境密切相关的，阐述这些看法也就可以清理自己对一些学术问题的思考和认识过程，同时也可以让读者了解本书中一些观念所产生的背景和由来。从阐释学的角度说来，我们每一个人对任何问题的理解和对任何文本的阅读，都基于我们观察理解事物的眼界或水平（horizon），而我们自己的眼界或水平之形成又与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个人经历、所受的教育以及构成我们基本思想观念的各种条件和成分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的思想既有其独立的发展轨迹，又和这个人的生活经历以及现实环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研究阐释学使我认识到这一点，而从一种文化和社会环境迁移到另一种文化和社会环境，更使我对

这一点有切身的体会。我愿意在此对自己思想观念的发展过程作一简略的回顾，虽然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路历程各不相同，但我们生活的时代和环境又有大致相同之处，所以这种个人思想发展的回顾也未尝不是我们所处时代和环境一个小小侧面的写照，或许也就不是完全没有超出个人经历和见解的参照价值。

我是“文革”之后作为第一届研究生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而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的，可是对文艺和理论的兴趣则在念中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很强烈。在我三岁时，年迈的父亲就开始教我识字，我现在还记得他常常带我上茶馆，用手指蘸着茶盘里的水，在桌面上写字来“考”我的样子。在小学三、四年级时，父亲就给我买了《三国演义》、《水浒》、《说岳全传》这样的书让我读。虽然父亲在我 11 岁时就去世了，但他对我后来在文科方面的兴趣发展却有很深的影响。在中学里，我对外语和外国文学发生了兴趣，读书也由文学扩展到历史和哲学，可以说那时候已经开始在做将来成为一个学者的梦。“文革”十年，外在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但藏在内心深处的梦却并没有被摧毁，反而使我更关注内在的精神生活而不管外在现实是如何艰难险恶。当时的情形，可以说内在的渴求与外在的环境是脱节的，而我发现内心深处的梦比外在的现实更为真实，精神的活动是使生命有意义的唯一活动。“文革”后到了北大，内心的追求与外在现实才逐渐重归一致，并给了我好几年时间在国内也许是最好的学习环境里安心读书。我可以利用北大收藏丰富的图书馆，有可以互相切磋的学友，更能以杨周翰、李赋宁等许多学界前辈为师，而我最引以为幸也给我最大影响的，则是能得到朱光潜和钱钟书两位先生的指点。朱先生在晚年仍以坚持不懈的精神投入有关文艺和美学的论争，重新翻译和解释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纲》和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以惊人的毅力完成维柯《新科学》全书的翻译和评价，更不断辛勤笔耕，把自己关于

美学、人道主义和形象思维等各类问题的见解写成文字发表，对当时许多理论问题的探讨和思想的解放，都起了重要作用。我在北大有机会经常向朱先生请教，和他讨论许多文艺理论问题，实在获益匪浅。我到北京之后不久便有机会认识了钱钟书先生，不仅常常去三里河造访，而且还与钱先生有不少书信往来，对钱先生的学识和人品都由熟识而深深拜服。读钱钟书先生的著作，无论是白话写成的《旧文四篇》或是以典雅的文言写成的《管锥编》和《谈艺录》，那极其宽阔的学术视野、深刻的洞察力、令人惊叹的渊博学识、细密而使人心悦诚服的说理，那舒卷自如、充满机锋、睿智和幽默的语言，尤其是把中西各种典籍著述旁征博引、使之相互发明的研究方法，固然是无人能学得来的，但却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指引我打破学术的藩篱，在尽可能广泛的范围内去研究中西文学和文化中可以和值得比较的问题。正是在钱先生指点之下，我开始比较广泛地阅读了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一些重要著作，并在1983年4月至1984年3月的《读书》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初步介绍了包括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等20世纪西方各派的文论。从一开始，我就抱着孟子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心章句下》）的态度，对西方各派文论，我都有了解和研究的兴趣，但又绝不全盘接受和盲从某一派，对其走极端的看法则更不肯苟同。这不仅是所谓中庸之道，而更是钱钟书先生的指点。钱先生在一次谈话中曾把《谈艺录》序里所说“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的那种研究方法，半开玩笑式地自称为“折衷主义”。后来他向我解释说，虽然“折衷主义”自19世纪以来已变成一个贬义词，他却是在古典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即法国启蒙时代哲学家伏尔泰、狄德罗等在著名的《大百科全书》里给折衷主义所下的定义：“不为任何理论系统所束缚，敢于独立思考（*ose penser de lui-même*），

取各派之精华。”^③ 这种坚持理性、敢于独立思考的精神，也一直是我在自己的研究和写作当中力求做到的，它使我一方面尽量去了解和汲取文学批评和其他学术研究中的各种理论，但同时又与之保持一定的批判性距离，避免成为任何一派理论或任何一位理论权威的盲从者和狂热信徒。不过在 80 年代初刚刚开始介绍各派西方文论的时候，虽然那些理论不能尽如人意，但对于打破自五六十年代以来简单的政治判断代替认真的文学分析与审美批评那种沉闷压抑的局面，20 世纪西方文论在“文革”后的中国确实能使人耳目一新，具有振聋发聩的激进意义。

我于 1983 年离开北京来到美国，在哈佛大学做了六年学生，可以说有相当理想的学习环境。哈佛不仅有全世界最大的大学图书馆，而且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各种中文图书和期刊也是首屈一指的，其中包括台湾、香港和世界各地有关中国研究的书刊，许多是我在国内没有见过的。哈佛不仅有好教授，而且研究生也相当出色，同学们互相之间可以有很多启发。我在哈佛比较文学系，六年的学习的确有很丰盛的收获，而且一面做学生，一面陆续在美国一些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1989 年从哈佛毕业后，我就一直在加州大学河滨校区做教授，仍然是研究比较文学和文论，尤其是东西方比较文学和文论。在美国大学新的学术环境里，我发现一方面是学术的多元和自由，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盲从权威，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表现在文学批评方面则是人云亦云，立论往往走极端而不合乎情理。作为一个对东西方比较研究有兴趣的中国人，我感受颇深的是有不少西方学者，包括一些汉学家，都过分强调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把中国视为与西方全然不同的他者。这种把不同民族语言和文化作二项对立的思路在西方有很深的传统，早在古代就已表现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

③ 钱钟书先生 1980 年 6 月 11 日给我的私人信函。